

张家德 著

遵义会议系列研究

从黎平会议到

巧渡金沙江



云南大学出版社

湖南

77

通道

献给遵义会议六十周年

(滇)新登字07号

责任编辑: 赵国树

封面设计: 张 愚

遵义会议系列研究

——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

· 张家德 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云南大学校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 字数: 360千

1994年10月第1版 3/5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ISBN 7-81025-452-9/k.90

定价: 16.00元

遵义会议系列研究

—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

张家德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前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断可谓千真万确。早在20多年前，看到电影《四渡赤水》时，人们纷纷议论这部出色的影片，突然结尾在巧渡金沙江的镜头上，感到事件、时间、地理跨度大，不太明了促使这两次战役（四渡赤水之役与速渡金沙江之役）所发生直接关联的根本因素在何处？

我带着这个问题下了一番功夫。这要感谢贵州1983年率先出版的一部《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它使资料穷困的笔者有幸看到许多史料。在读到曾列席遵义会议的伍修权口碑文献《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时，这位无产阶级老革命家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即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先有一段时间和血的教训后所“酝酿”的；尤其是文中醒目的标题“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准备”对我的启迪很大，故笔者一直沿用这个受益不浅的标题，作为这部拙著第一章的标题。而遵义扩大会议决定的重大问题，又不是几天会议能够解决的。最明显的是勉强解决的组织分工问题。过去许多论著，都说毛泽东当选为党的总书记，还把“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搅合在一起说这个“小组”就是最高的决策机构，毛泽东当然成了全党全军最伟大的领袖和最高的红军统帅！幸而在党史资料 and 各类文献的不断发掘和公布之中，笔者又得到先前研究遵义会议的许多同仁的启发，在1984年初浅的撰成《论遵义会议精神》一文，提出了遵义会议四段论，即遵义会议完整的光辉内涵，是由遵义会议的酝酿与准备阶段、会议召开阶段、补充与发展阶段、总结与完成阶段构成的。这个新观点较好地解答了四渡赤水之役与速渡金沙江之役的关系，由此获得学界泰斗马齐彬、王仲清等的欣赏和推荐；并由1985年云南省党史学会及省委宣传部审定，推荐参加在遵义举行的“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七周年学术讨论会”（云南仅三个名额）。出乎意外的，却受到并不“尊

类高层次的学术会议;俗话说“树挪窝则死,人挪窝则活。”笔者鄙弃那种对党的政策、对上级批示阳奉阴违的“土围子”后,这个研究课题在云南教育学院才获得重视,接连参加广州和西安的学术会议。特别是在西安——延安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会师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议”上,再次得到同仁的大力帮助,看到许多档案资料,这恰似如鱼得水,致使我在这个课题上获得充分发挥、准确阐述的可靠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笔者前后发表50余篇有关红军长征时期的论文。并于1992年蒙学院资助2000元,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了一册约30万字的论文集《红军转战云贵川论集》。秉着始终如一的追求,在下海如潮的冲激下,笔者依然锲而不舍地反复探索遵义扩大会议阶段论的科学性。即,召开阶段应包含决议的形成,总结与完成阶段的上限应当界定在白沙会议,而桐、娄、遵战役直至抢渡金沙江战役的胜利,正是完成阶段的两大标志。因此,笔者遂将四段论改作更为确切的三段论:即,酝酿与准备阶段、召开与决议阶段、总结与胜利阶段。

我在完成了50万字《中国抗日远征史》第一卷《保卫滇缅路》的出版之后,又获得志汶的大力资助,鼓舞着我把遵义系列会议的研究,搞出更大的成果问世,以免埋没了近十年来所集的罕见史料。因此,笔者不顾身患糖尿病及颈椎病等难愈之疾,按遵义会议三段论的脉络,日日夜夜地笔耕,把遵义扩大会议前前后后、围绕着它所形成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粗略地罗列出来加以必要的评述,以抛砖引玉,供给同仁深入地把遵义会议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局面。

说起长征途中的会议,前一段时间仅仅就一个扎西会议就引起了一番争鸣。笔者亦很有一些感触,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参与了这一讨论。这就更加激发了我把这一系列会议公诸于世的恒心。酝酿与准备阶段的3个会议,召开与决议阶段约10个会议,总结与胜利阶段约43个会议,共约56个会议。人们不禁要问,战争这么频繁、紧张,哪有这么多时间召集会议呢?焉知这正是战争环境养成每天晚

上等待前线战报至深夜,以及凌晨左右研究次日行动部署的习惯;在一反李德独断专行的瞎指挥之后,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要求开会民主决策军事,更何况张闻天是位充分发扬民主作风的“明君”呢!因此,几乎每夜常有一二十人参加研究作战部署和行动方针的军委及政治局会议,即使后来成立了前敌司令部和三人军事领导小组,都未能改变这一民主决策的习惯。56个会议,均属于遵义系列会议这一范畴,故笔者原定拙著书名为《遵义系列会议研究》;孙代兴认为遵义会议已成专有名词,以改“遵义会议系列研究”为好;出版社负责人又认为,加一个副题——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更为醒目、确切。如此这般就形成了目前这个书名。

川滇黔边区游击队纵与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的武装斗争,与遵义会议有何关联,亦是很多人不能认识、或者不太理解的。他们都是红军主力北上以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创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游击武装,滇黔桂边应是南方第15个革命根据地,云南当是南方发展游击战争的第9个省。因此,笔者又把它们作为遵义扩大会议决议阶段所发展的游击战争列入第四章阐述。

尊重历史,摒弃不实之词及蛊惑之论,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可说是拙著最显著的特色。如毛泽东虽然“实际上”对红军的指挥以及在重大问题上,起着提供“决策”而很具关键性的作用,但他在遵义会议分工上,仍然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是助手职位。周恩来是“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团长,就充分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又如扎西会议只是在威信县县治所在地举行的9~10两日的政治局会议,并不包含威信县境内水田寨、大河滩、院子场、土坎四个会议的内容。桐、娄、遵大捷,总择其“消灭吴奇伟两个师,缴获枪在两千以上,俘敌约三千人”来宣扬;并未注重总司令部核实的统计数,以“击溃”两师之说,共俘人在两千以上,缴枪一千以上的事实才比较可靠。毛泽东包办指挥的鲁班场战斗的失误,占领盘县、平彝错失先机,计划打击尾追滇军、罗平落脚、滇东决战等等,均有实事求是的披露,这才符合凡战争兼有胜负的客观规律。十分明显,

在整个遵义扩大会议这一历史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均有不朽的丰功伟绩。从1935年2月初中央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是来源于彭、杨决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的建议;再克遵义大捷,是中央采纳了彭、杨的作战方案予以实施的硕果;鲁班场战役失利,是毛泽东不重视彭、杨建议移至鸭溪——白腊坎之线的有利地形作战;3月中旬,中央接受彭、杨“应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的建议,而三渡赤水;3月下旬,中央以彭、杨建议而转向东南比较有利的流域,南渡乌江;4月中旬以放弃在广顺之西立脚,而速渡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求得以滇、黔边与孙纵队作战的建议及改向七盘山以西、平彝以南的罗平地域前进的建议,均为中央采纳;4月下旬,中央根据彭、杨“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的建议,从而作出“我野战军明28日开始西转”的决定,最后获得决策速渡金沙江的胜利。笔者认为,单单就这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不仅充分表明了以彭德怀、杨尚昆等为代表人物的殊勋卓绝,同时亦展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红军这一英雄群体的智慧和血肉所融合的伟大结晶!

拙著提出了一些简陋的新观点,如遵义会议历史时期三段论,战略目标金字塔论,通道“三人团”听证会议,扎西会议连续在9~10日举行并决定回师黔北,第二次遵义会议,第二次佯攻贵阳,第二次进云南的战略目标,寻甸转兵,禄劝发布三路渡江令等等,以及许多难免的误笔,亟待识者不吝指正。

拙著的出版,承蒙军科院、中央档案馆、本院科研处等单位及杨学军、殷子贤、志汶、赵国树、夏英齐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赞助,笔者谨表深深的谢意!

云南教育学院历史系

张家德

一九九四年五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的酝酿与准备阶段…………… (1)

- (1) 通道“三人团”听证会议提出“继续西进”
入黔…………… (2)
- (2) 黎平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和正式变更战略
总方针…………… (9)
- (3) 猴场政治局会议限制“三人团”的领导权,
胜利强渡乌江天险…………… (16)

第二章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的召开与决议阶段…………… (23)

- (1) 遵义政治局会议暨扩大会议的召开
——伟大的历史转折…………… (24)
- (2) 桐梓政治局会议通过由川南地区
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 (42)
- (3) 大坝市政治局及军委联席会议
要求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入川…………… (48)
- (4) 土城政治局会议部署消灭
分进合击之敌以及一渡赤水…………… (52)
- (5) 古蔺石箱子政治局会议

确定“暂缓北渡长江”	(70)
(6) 水田寨政治局及军委联席会议 完成秦邦宪交权张闻天	(81)
(7) 大河滩党中央及军委联席会议 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88)
(8) 院子场政治局会议审查通过 遵义《总结决议》及《决议大纲》 ...	(92)
(9) 扎西政治局会议特决定实行 各军团缩编及回师黔北	(98)
(10) 石坎子中央及军委联席会议 关于战略问题以及与红二、 六军团相呼应	(121)

第三章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的总结与胜利阶段

(1) 白沙场党中央及军委联席会议 计划二渡赤水	(127)
(2) 鱼岔政治局会议决 速渡赤水开展战局	(138)
(3) 展开向桐梓进攻,准备遭遇黔敌为目标的 中央政治局连续会议	(144)
(4) 九坝会议决策决消灭娄山关黔敌, 乘胜夺取遵义城	(160)
(5) 以“生存黔北”,发动“转换战局的战役” 为目标的遵义战役的政治局连续会议	(165)

- (6) 第二次遵义连续会议特设朱、
毛前敌司令部,西进突击周敌 (183)
- (7) 鸭溪会议变更行动,
迂回攻击长干山周敌 (190)
- (8) 苟坝政治局及军委联席连续会议
取消长、新作战,组建周、毛、王
“新三人团”,消灭洋、西犹敌 (195)
- (9) 决定红军的战略方针仍以黔北为
主要活动地区,以消灭薛、王为主
要作战目标的政治局连续会议 (204)
- (10) 以三渡赤水为战略目标的
坛厂——仁怀政治局会议 (212)
- (11) 大村会议决乘敌不备折而
东向,四渡赤水寻求机动
..... (220)
- (12) 向西南行动,消灭敌人,争取
控制乌江、迅速南渡集结,
寻求机动的政治局连续会议 (227)
- (13) 突破堵敌截击,相机出
东南或南机动,以转移
战局的政治局连续会议 (242)
- (14) 迅速西进,向广顺、长寨以
西及西南地域休息,准备回
击追我之滇敌的连续会议 (255)
- (15) 老鸦塘——博洞会议决速渡北盘江,
先机进占兴仁、安龙地区,首先向滇军

- 作战 (260)
- (16) 石林碑——双桥河会议决以遭遇滇军刘旅与周敌姿势,继续向西北转移,寻求与万敌作战 (263)
- (17) 铁锁菁会议决攻占平、曲、沾、马,控制昆明东北要道,便于与追敌及新调动之敌作战 (266)
- (18) 富村党中央及军委联席会议决放弃向平彝行动,改集沾益、曲靖求与追敌决战,以取得新的发展局面 (270)
- (19) 溪屯村——鲁口哨中央及军委联席会议决定开始西转,制订速渡金沙江战役的战略计划 (278)
- (20) 丹桂村中央及军委联席会议审定《关于渡金沙江(的)政治命令》,分取禄、武,以便三军团在鲁车、志力渡架桥 (287)
- (21) 小仓街政治局会议改洪门、皎平、龙街三路渡江,限4日架桥;决培养与提高支部的工作能力 (291)
- (22) 中武山政治局会议改一、三军团由皎平渡江,攻占通安、会理,五、九军团阻敌于石板河~皎西及金沙江右岸 (301)
- (23) 张官冲政治局会议决在蒙姑、巧家之线及中武山扼阻追敌,赤化通安,续攻会理打援 (309)

第四章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决议阶段所发展的游击战争

- (1) 扎西会议发起的川、滇、黔
边区革命运动 (316)
- (2) 红七军创建滇、黔、桂边区
游击根据地 (362)

遵义扩大会议使得中国革命的道路，由“左”倾教条主义，从此转到了独立自主的正确道路；红军和党的领导，从此转变到有了正确的新的领导核心，党开始走向成熟。这是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中国革命由挫折、失败，从此开始转向战略上的主动，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一系列的伟大转变，构成了完整的遵义会议精神。这个扩大会议之所以十分完整，并不单是在遵义召开的会议期间所能全部解决的，而是在非常曲折的斗争历程中，通过若干政治局会议，才得以胜利实现。这就是说，这一系列的政治局会议，无一不是围绕着遵义扩大会议酝酿、准备，补充、实践，再总结、再发展，直至遵义会议决定的行动方针胜利实现。因此，遵义扩大会议经历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笔者把这一系列围绕着遵义扩大会议而举行的若干政治局会议，抑或中央及军委联席会议等等，称作遵义会议系列，并由此将这一历史时期划分为酝酿与准备、召开与决议、总结与胜利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章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酝酿与准备阶段

毛泽东说：遵义扩大会议“酝酿已很久”了。^①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在1934年至次年的跨年之际，有三次重要会议的召开，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三个会议的实质虽然都集中反映在野战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但是，这个问题早就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猴场会议应该是它的丰硕结果。其中，在湘江战役达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11945年5月24日、6月10日。

到了顶点^①。为什么定这样的上下限呢？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与前四次反“围剿”的实际情况相比之后，广大野战军指挥员已经逐渐滋长了改变领导的情绪，这必然反映到争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上。而7天7夜的湘江战役，红军又付出了3万零500余人惨重的代价，因此湘江战役后成为指战员们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的顶点。周恩来指出，进入贵州前后，一路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就“开始酝酿召开政治局会议了”^②。这就表明，从老山界起，野战军内部出现了日益增长的思想情绪和问题的激烈争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是属于遵义会议前的酝酿阶段。以毛泽东为主的正确意见，在通道、黎平、猴场三个会议上都否定了李德的错误路线，敌军“围剿”红军的部署被粉碎，野战军的战局出现了转机，这就具备了遵义扩大会议召开的有利条件和思想基础。正如陈云手稿认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基于在湖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③这就展示了从黎平会议起，是遵义会议前的准备阶段，推往老山界，合起来可称为遵义会议的酝酿与准备阶段。

(1) 通道“三人团”听证会议 提出“继续西进”入黔

湘江战役后不仅野战军广大指战员要求改善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而且中央上层领导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早在1943年11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曾指出：“在湘、桂、黔

①参见《刘伯承回忆录》第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老山界本名越城岭，座落在桂、黔、湘边境。

②参见《周恩来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

③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2月5日夜～6日。

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其实质就反映了这场争论。

(一) 会议举行的时间与地址

当1934年12月12日敌情发生了变化，军委获悉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敌其它各路仍继续向洪江、靖县推进，“企图阻我北进”，桂敌有拟由林溪进至团头消息。^①这样，在通道地域集结，虽使损失很大、疲惫不堪的野战军休整了大约3天，但仍然显得“有进退两难的样子”。毛泽东因此建议野战军“一定要改变进军方向，朝贵州走。”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很有同感，认为红军损失很大，不宜北进，遂“同意召集会议研究”^②。中央领导层的这种争论，由军事路线方面集中到战略方向上的尖锐对立。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代表的“继续西进”入黔的建议与李德、博古北进湘西会师的主张相冲突。战略方向上这种公开而激烈的争论，关系着野战军的生死存亡！党中央不得不开会研究。何况，毛泽东“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的建议，“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毛、张、王)‘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③笔者由此判断，当时党中央名义上主管军事的周恩来冲破李德太上皇的专断局面，紧急召集了这次临时而短暂的所谓“飞行会议”。从“飞行会议”与12月19时半拍发“万万火急”之词的电令判断，会议举行的时间当在也必定在习惯性开会的当天傍晚7时左右。会后超过1—2小时拍发的电令，就不能称“万万火急”了。

会议举行的时间既可确定在1934年12月12日傍晚7时左右，举行会议的地址也就有机可寻。中央纵队与军委纵队当晚宿营绥宁

^①参见中央及军委《关于我军13日西进的部署》(万万火急)1934年12月12日19时半。

^②参见《遵义地区党史资料》第2期，5页，1983年8月3日。

^③(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24～12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县的芙蓉镇，亟有可能是在芙蓉举行的飞行会议。但是，不仅党中央所在的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李维汉在《回忆长征》(上)中说：“红军于1934年12月11日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后，中央领导人举行了会议。”而且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与干部团的成仿吾、总部黄鹄显均认定了通道会议的召开。对于到底有没有通道会议这个问题，当事人作了明确肯定的回答。邓颖超说“恩来同志讲是有(的)，开过黎平和通道会议”。^①会后，博古次日去洪洲司等候在后卫五军团的陈云与刘伯承面晤，传达了会议内容，因而陈云的遵义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中，就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基于在湖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说法。^②所谓“通道的各种争论”，当然是博古约见陈、刘2人时传达的通道会议内容。不在通道开过会，何须冠称“通道的各种争论”？笔者由此认为，这就是通道会议各种争论的同义词。与博古传达的同时，周恩来则到先头部队一军团红1师驻地芽屯堡作传达、动员。红1师第3团总支书记萧锋在他的《长征日记》与《十年百战亲历记》中，明确记载了周恩来当时传达西进夺取黎平的任务，是在“通道召开”的会议所确定；“插向黔东(南)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③由此可见，当事人及军委纵队干部团、总部人员的佐证之词，表明了虽然中央纵队12月12日驻绥宁县的芙蓉地区，而军委纵队又前出驻通道县城，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论证。当事人因年代久了，若说对无关紧要的一个村一个镇会忘却，在一个县城激烈争论战略方向的变更却是难以遗忘的。所以，陈云手稿、当事人周恩来的指证，中央纵队领导人李维汉与毛泽东的警卫员陈、吴和干部团、总部的成、黄等人的回忆，以及萧锋

①《邓颖超对中国革命博物馆提出在长征中是否开过黎平和通道会议的回答》1971年7月7日。

②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2月5日夜~6日。

③参见萧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第1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萧锋《长征日记》第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